

# 中国现实造就的叛逆者<sup>※</sup>

——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文幼章

◎ 陈 明 赵 毅

**【摘 要】** 中国的革命现实改变了文幼章的政治观念,促使他坚决辞去传教士职务。与中国革命青年的接触,使他从空想的改良观点转变为献身革命的观点,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文幼章始终心系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并为之奔走效劳,不愧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

**【关键词】** 叛逆者; 马列主义; 新生活运动; 和平运动

**【中图分类号】** G1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1)06-0158-5

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文幼章曾长期在中国进行实地观察,敢于说出他所看到的真实的中国现实。面对中国的革命现实,文幼章毫无顾忌地支持中国革命,坚决辞去教会职务,始终关心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可以说,他是一个中国现实造就的叛逆者,中国文化坚定的传播者。

## 一、中国现实促使他辞去教会职务

基督教是踏着军事征服者的足迹进入中国的,它只不过是外国的政治工具而已。传教士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而效力,自然会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反对。对于20年代中国人民的反基督教风暴,文幼章认为是民族意识的高涨,能够理解。1926年2月,传教会干事会在重庆举行年会,文幼章应邀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中国传教士希望外国同行能够放弃不平等条约给予他们的特权,但

是,大部分外国传教士坚决反对。文幼章主张尊重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感,取消不平等条约,并用尖锐的语言宣称:“我在《圣经》中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话:‘你们要走遍世界,用枪弹把福音射进每个人的心灵。’”<sup>[1]</sup>因此,他被贬到小城忠州。文幼章到忠州传教不满4个月,就发生了英国舰炮轰击万县事件(即1926年9月5日,因英国轮船公司与四川军阀杨森冲突,导致数名英国军官被杀,英国军舰就炮轰万县,造成数千军民死伤),激起四川人民的反帝怒潮。次年初,大量传教士逃离中国内地,文幼章也逃到上海法租界。教会对此事件的不公正反映,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恶劣印象。于是,他致力于实现“把传教活动和政府的行为完全分离开”<sup>[2]</sup>。他所致力所谓的“分离”,在当时情况下,就中国现实和基督教侵略性而言,只能是一种空想。

※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项目批准号:SKX2010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陈 明,四川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赵 毅,四川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博士,四川 成都 610064。

国民党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翼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于1927年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实施大屠杀,此后建立的南京政府成为彻头彻尾的反共政权。1927年3月9日,华西差会在上海召开第三十一届年会,讨论教会的自决问题。

中国传教士认为,外国传教士的保守观点常常使他们与中国反动派同流合污,而中国需要的是符合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符合本民族意识和心理活动的教会。文幼章热情洋溢地响应中国传教士的呼吁,但差会当局并不赞同。许多外国传教士认为这是“毫无道理的东西,无非是想把中国和中国教会从一种凭空想象出来的所谓外国压迫下解救出来的空谈”<sup>[3]</sup>。中国基督教徒不可能实现自决,因为传教殖民者和基督教信奉者之间的关系,是人们熟知的统治者和附庸者的关系。1928年,文幼章接受重庆小什字路自助教堂牧师的差事。在与中国青年的接触中,他相信,任何把神学的桎梏强加在中国青年身上的企图都是徒劳的,他们会感到格格不入。这种自由主义神学与教会发生冲突,他被迫辞去牧师职位。这次打击,却意外地给他带来好处。他因从事英语教学而成为名人,从而把他引入国共两党的政界。从1934年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文幼章感到自己的传教工作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并对中国基督教教育感到失望——教会教育变成了国民党的帮凶。

文幼章在成都参与学生反内战、要民主的斗争,基督教华西差会当局既害怕,又恼怒。当文幼章出席成都群众大会,国民党当局要威逼他离开中国的消息传到加拿大后,1946年1月23日,加拿大联合教会向他发出“非正式”信件,要他作出最后抉择:要么留在教会,按照教会规章制度办事;要么脱离教会,去追求他的目标。文幼章的辞职经历了一个犹豫、反复的过程。1945年2月他将辞职信寄给在加拿大的夫人文月华,并要求严守秘密。文月华看信后表示坚决反对,并把此事告诉了加拿大海外传教会的主席和干事阿努普。这位主席于3月27日给文幼章写了一封信,说什么脱离

教会的人,绝大多数都蜕化堕落、身败名裂;并告诫他不要与共产党人为伍。威迫之后,又来利诱,说什么要作他的坚强后盾,帮助他实现自己的理想。得此信后,文幼章暂不提辞职之事。第二年元月,加拿大联合教会的“非正式”信件,可视为最后通牒。文幼章看信后便毫不犹豫地决定辞职,于1946年5月5日上交辞职信,这说明他的辞职是非常审慎的。他辞职的动机是:希望摆脱强加在他的信仰上的那些不科学的桎梏;以及共事的教友们常常利用这些桎梏来模糊社会问题,并阻止采取果断行动。在旧中国,基督教教会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治工具,教会的信仰和信条是迷信,更是文化侵略,必然遭到坚决的抵制和强烈的反对,这是他要改良而寸步难行的根本原因。文幼章在成都接触到马列主义的学说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思想,提高了他的政治识别能力,认识到教会的信仰和信条与科学相冲突,毫无科学性可言。所以,文幼章在积极参加革命学生和民众的进步活动时,感到教会信仰和信条是他从事实际活动的障碍和负担,他必须作出抉择。引起他辞职的导火线则是国民党三青团在成都校园内对同学们进行监视、威胁和告密活动。他找到华西协和大学副校长林则指控,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当中有捣乱分子”,“只不过是——一群共产党”<sup>[4]</sup>。教会成为暴政的代言人和帮凶,文幼章非常痛心和反感。

辞职以后,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生平第一次感到了自由。”<sup>[5]</sup>解脱后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1982年8月11日,加拿大基督联合会正式撤消三十年多年前因文幼章支持中国革命而对他所作的指责,并对他的名誉所造成的伤害表示道歉。中国记者代表中国人民专程到他家中祝贺,并问他当年辞去教会职务的原因:事隔多年,为什么教会要向他道歉?已85岁高龄的文幼章明确地回答说:当年教会反对我,原因是我揭露和谴责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我完全看清了帝国主义的野心,也看到宗教的力量已被它利用。现实改变了我的政治观念和歷史观念,这是促使我坚决地自

愿辞去传教士职务的原因。”<sup>[6]</sup>

中国的现实使文幼章认识到在西方的所谓“自由中国”，一小撮地主和官僚资本家为代表的国民党，利用外国的武器和金钱，屠杀异己。这构成了文幼章的意识形态转变的基础，他从相信教会的积极力量和相信个人的转变，变成了相信必须进行社会革命。

## 二、中国革命青年引导他转变政治观点

文幼章敢于面对中国当前的现实，而且认为中国共产党扎根于人民，曾经经过千锤百炼，中共党员是中国社会最优秀的分子，有严明的纪律、坚定的信念和牺牲的精神，代表中国的未来。而国民党即便有美援和美式武器，也必将垮台。这就是他所说的全局观点：“国民党是过去的党，共产党是未来的党。”<sup>[7]</sup>因此，文幼章亲近中国革命者，接受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革命思想的影响，改变了他的政治观点，使其成为中国革命的宣传者和支持者。

1934年至1941年，文幼章的传教工作到了寸步难行的绝境，只好到重庆郊区精益中学教英语，并创办了《精益英语周刊》。由于《周刊》的政治评述，抨击时弊，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激进的政治观点，不仅引起激烈的争论，还受到加拿大教会高级官员的教训；甚至德意两国领事向中国政府提出指控，要求把文幼章驱逐出境。《周刊》扩大了文幼章的知名度，也使他更深地卷入了中国的政治生活，被蒋介石、宋美龄聘请为“新生活运动”的顾问。1940年，文幼章看到了国民党“解决共产党问题措施”的决议文本。这个文件是要在抗日战争中消灭共产党的计划，是在国民党中央政府假装不知的情况下进行的。其次，他反对宋美龄亲自督导下培训的新生活女青年队与三青团合并，还认为号召学生在公开的仪式上集体宣誓效忠是法西斯行为。文幼章拒绝蒋介石夫妇的挽留，与其分道扬镳。此后，文幼章在给宋美龄的信中，把国民党比喻为是这样的接生婆：“这个接生婆要设法把这个新生的婴儿（中国的民主制度，作

者注）扼杀，好攫取它的遗产。”<sup>[8]</sup>文幼章认为国民党缺乏社会责任，简直象霍乱病一样。

帝国主义对其它国家的掠夺，促使文幼章深思和觉醒，加拿大社会主义思潮又给他以深刻影响，于是1934年他在查塔姆扶轮社演讲时，为中国革命呐喊：“俄国是唯一有光明前途的国家。……我将回到中国去，告诉那里的青年：你们要注意，帝国主义者已经包围了你们！他们要剥削和压迫你们！向左转吧，青年人，向左转！瞧俄国人是怎么干的！”<sup>[9]</sup>一字一句都流露出他对中国前途的关爱之情。但是，他的演讲弄得大部分听众瞠目结舌，就连他十分敬爱的岳母，也把印着他讲话的剪报扔进了垃圾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文幼章认为，日本帝国主义正沉醉于帝国势力的扩张远景，并吞中国是为实现帝国梦想而必然采取的步骤，对中国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文幼章延长了在加拿大的逗留时间，经常在加拿大各地演讲，主题是帮助中国的抗日。他介绍共产党的抗战情况，指出共产党的游击战最能体现中国人民的作战努力，甚至当众用英汉两种语言演唱他称之为现代中国“马赛曲”的《游击队员之歌》，广受听众欢迎。

“金陵大学星星团”需要一个安全的活动场所，文幼章认为“星星团”成员是学生中热心公共事务的新浪潮先驱，慨然提供其住宅——华西坝十一号给学生使用，还交给他们一把钥匙。他当时并不知道星星团成员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成都的负责人。这些进步学生在住宅内阅读马列主义精典和延安来的文章，并开会讨论，印发小册子。文幼章经常参加他们的讨论，并提供保护，他们笑称自己是“十一号住宅的耗子”。“十一号住宅的耗子”引导着文幼章越过横沟，从空想的知识分子改良观点转到献身革命的观点。而献身革命的人则承认斗争和阶级冲突，相信这是历史、社会变化的根本途径和必由之路，这条路就是“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sup>[10]</sup>。1945年，昆明学生反对内战，示威游行，发生了“一二·一”惨



案。成都学生决定举行集会、游行进行声援,并邀请文幼章到大会演讲。文幼章欣然应允,于12月9日来到少城公园的会场,登上讲台,向四名遇难的昆明学生致敬,愤怒地指出:这四名学生“在日本法西斯铁蹄下受了八年苦以后被处死了,罪名是争取和平、民主和统一”<sup>[11]</sup>。在场的国民党军警向台上扔了一棵未拉导火索的手榴弹,他不屑一顾,大义凛然,继续演讲。文幼章把这次公开支持中国革命的行动,看着是他生命中的转折点。文幼章在少城公园的演讲,在教会和国内都引起了强烈反应。国民党教育部于1945年12月照会加拿大联合教会和华西差会,要文幼章一月内离开中国,否则将被驱逐出境。与此同时,多伦多传教会执事会代理干事钟鸣牧师在同阿努普博士商谈后,于1946年1月23日写了一封“非官方”信件给文幼章,对他进行严厉指责,并提出两条道路让他抉择:要么留在教会,按照教会规章制度办事;要么脱离教会,去追求他的目的。1946年5月,文幼章正要借道上海返回加拿大途中,接到周恩来的邀请信,毅然转道,来到南京中共代表处。周恩来委托他办个刊物,向外国介绍美国政府出钱、出枪,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真实情况。6月9日,《上海时事通讯》英文版第一期面世,宣告要以民主精神,为和平、进步和统一的中国而奋斗,号召外国不要干涉中国,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从创刊到停刊,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原外交部长乔冠华是这样评价的:“它对我们有极大的价值……在这场斗争中,文幼章是我们的战友。”<sup>[12]</sup>

### 三、“中国革命把我由一个传教士变成了新人”

1947年,文幼章回到加拿大后,随即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政治活动中,成为加拿大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在接受《多伦多星报》采访时,文幼章语惊四座,指出蒋介石在1948年新年之前就会倒台,或坐牢或流放美国,甚至会被枪决。1948年1月,文幼章夫妇编印出版《加拿大远东时事通讯》月刊,并把它看作是《上海时事通讯》的延续,发行达30余年。1949年5月6日至8日,加拿大和平大

会成立,文幼章被推举为主席。在和平运动的推动下,他们首先要求加拿大政府停止援助即将崩溃的国民党政府。他既从事和平运动,又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经常被和平主义者斥为自相矛盾,他的回答是:“蒋介石同他的美国和加拿大朋友选择了毁灭性的战争。蒋的政权腐败、堕落。所以,作为一个宗教人士,我感谢上帝,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够迅速地以压倒优势赢得战争的胜利。这是中国人民能够实现和平和改革的唯一途径。”<sup>[13]</sup>1949年新中国成立,加拿大和平运动委员会最先向加拿大政府提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3月,文幼章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国际和平大会上,作为五人委员会的成员,共同起草了《斯德哥尔摩宣言》,要求将原子武器宣布为非法;将首先使用原子弹的政府官员宣布为战犯。朝鲜战争爆发的当天,他在温尼伯的群众大会上赞扬朝鲜,谴责南韩。1952年2月,文幼章夫妇首次访问新中国,周恩来总理请文幼章去东北调查美国进行生物细菌战的情况。他同意只身前往,足迹遍及农村、沈阳医院和实验室,确信美国在中国东北进行了细菌战。随即给加拿大外长皮尔逊发了一份电报,称:

“经亲自调查,已得到确凿证据,足以证明美国正在大规模地对中国大陆进行细菌战,强烈要求你抗议这种违反联合国协议的可耻行为。”<sup>[14]</sup>在沈阳记者招待会上,他推测加拿大卷入了有关活动。此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外广播中发表讲话,证实他看到了美国细菌战的证据,并相信中国人民能够打败美国的罪恶进攻。文幼章的讲话再次在加拿大国内掀起轩然大波,政界媒体指责他蛊惑人心、叛国投敌。同年12月21日,文幼章获得斯大林和平奖金。

文幼章夫妇于1956年、1959年和1972年应邀访问中国,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领导人亲切地接见了他们。他们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激动人心的场面,为中国取得的成就而欢欣鼓舞。他们认为,中国发生的变化很可能是有历史记载以来人类最巨大的变化之一。他用地道的四川话,深有感触地说:“我对中国革命帮助很小,而

中国革命却把我由一个传教士变成了新人。……我爱我的第二故乡中国！我由衷地为她的发展、进步感到高兴。”<sup>[15]</sup>1970年，中国和加拿大建立外交关系，文幼章多年以来的宿愿终于得以实现，这也是他坚持出版《加拿大远东时事通讯》的主要目的之一。他亲自发电报给周恩来表示祝贺。

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分裂，使文幼章感到困惑。他试图从中调和，但没有成功。1966年，中国退出世界和平理事会，文幼章逐渐看出当时的国际形势与50年代不同，也考虑退出这个运动。文幼章也了解到，苏联已开始为中国拼凑一个新的“革命中央委员会”，主要候选人为，其一是王明，其二是张国焘。此时（1969年）张国焘碰巧就在多伦

多，苏联驻加拿大大使库卢希内，要求文幼章帮助他会见张国焘，文幼章拒绝了他的要求。1971年，文幼章决定结束与苏联及和平运动的关系，辞去了加拿大和平大会主席的职务，指责“苏联逐渐变成了一个同老牌美国帝国主义大肆争夺势力范围的新帝国主义超级大国”<sup>[16]</sup>。1993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宣布将“人民友好使者”的称号授予文幼章，其评价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贯同情和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sup>[17]</sup>

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国革命蓬勃的发展，促使文幼章辞去教会职务，转变为一个献身革命的人。他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不愧为中国人民始终不渝的国际友人。

#### 【参考文献】

- [1] [4] [5] [7] [8] [10] [12] [14] [16] 文忠志. 文幼章传[M].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109,307,328,295,210,289,336-337,417,494.
- [2] 渥太华加拿大公共档案馆文幼章文件: 文幼章给文焕章的信[Z].1926.
- [3] 华西差会文件. 第2箱第2档·比顿给阿努普的信[Z].1927.
- [6] 顾长声著. 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传教士评传·文幼章[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459.
- [9] 加拿大查塔姆每日新闻[N].1934.
- [11] 渥太华加拿大外交部(史料科): 维克托·奥伦致麦肯齐·金的函件[Z].昆明学生“事件”, 1945, 卷宗号: 11578-B-40.
- [13] 渥太华加拿大公共档案馆文幼章文件·对加拿大和平大会的主旨讲话[Z].多伦多演讲词档, 1949.
- [15] 洋人文幼章与四川[EB/OL]. <http://www.china-west.cn/gb/westnews/xhlt/szxw/userobject1ai95559.html>.
- [17]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全国对外友协授予“人民友好使者”荣誉称号统计表[EB/OL].<http://www.cpalfc.org.cn/ctop/yhsz.htm>.

(责任编辑 苏宁)